

銀川文史資料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我所知道的马鸿逵侵犯三边的情况	冯 茂 (1)
神仙山下的华北联合大学	陈玉田 (7)
银川郊区农业合作化的回顾	沈光英、王文采 (12)
银川市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述要	曹吉寿 (26)
西大滩的开垦者——记农建一师在宁夏	曹国清 (36)
银川西门唐徕渠决口、抢修经过	蔡仲廉 (47)
回忆卫生工作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范例	
——高温堆肥	吕鹤轩 (51)
忆解放战争中的三边分区医院	王克俭 (55)
回忆渤海回民支队中的随队阿訇	张树金 (60)
银川电影史话	李春林 (66)
回忆五十年代农村电影放映队	尚绪绎 (73)
银川地区清真寺概况	何兆国 (76)
话说“纳家户”	尤国林 (88)

佛教在宁夏·····	侯书琴	(93)
我知道的宁夏道教和儒教会的点滴情况 ·····	孟思齐	(102)
“瑞王”落户宁夏·····	赵贵春	(107)
马鸿逵泰山挖宝及宝物去向·····	文始玮	(114)
解放前驻宁247医院沿革及其起义经过 ·····	卫宝珍	(124)
马鸿逵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	黄耀	(129)
天成西是怎样倒闭的·····	曹吉寿	(134)
银川“京帮”的由来及其经营之道 ·····	米耀西	(139)
马鸿逵的“官盐代运所”·····	王中	(144)
解放前银川建市的前奏——银川市政筹 备处·····	柯宗翰	(149)
马步芳在西海固地区策划反共的活动 ·····	马辰	(155)
我参加国民党政府高等文官考试的经过 ·····	李有禄	(159)
辛亥革命在宁夏府城——银川市 ·····	胡迅雷	(163)
贺兰山岩画概述·····	许成、卫忠	(176)

我所知道的马鸿逵侵犯三边的情况

冯 茂

编者按：“存真求实”是编撰文史资料的唯一宗旨，冯茂同志是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是我们的老首长，他关心、支持文史工作，身体力行撰写稿件，是对我们的鼓舞和指导。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我阅读了《银川文史资料》第四辑刊登的“解放军夜袭兴武营”和“马鸿逵进犯三边片断回忆”两文，觉得有些内容不完全符合史实。我是当时三边分区的干部，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过程，现将我知道的一些实情陈述如下，作为对上述两文的补正。

一、兴武营当时是陕甘宁边区管辖的盐池县的一个村庄，村中有个小城是古时边防堡垒。边区管辖地域，国民党中央政府当时已明文划定。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大举进攻，马鸿逵从西线配合其行动，派兵进占了兴武营，这是明火执杖的侵犯解放区行为。作者把它说成“马鸿逵为了加强和巩固河东门户……防御陕甘宁边区解放军的干扰威

胁。”这是不合情理的。解放军为保卫边区不受侵犯，对侵占兴武营的马军发动袭击，是完全正义的，更不是什么对马鸿逵的“干扰威胁”，这个历史背景和是非问题需要分清。

二、“解放军夜袭兴武营”文中有关马部骑十九团到兴武营的时间等问题也与当时事实有出入：其一，马部骑十九团于1946年11月16日侵占兴武营，《盐池县志》对此记载清楚，并不是文中所讲：“这一团兵马原驻吴忠东塔乡一带，随后转移到天池子冬季移防兴武营。”天池子也是盐池县所辖村庄，在兴武营之东南方，相距约二十公里，天池子之东约四十公里处是盐池县城。骑十九团由吴忠到盐池县的兴武营、天池子等地是同时进行的，该团部驻兴武营，所属连队在其附近的余庄子大圪塔等处驻扎。其侦察骚扰活动向着东南方，不仅到达天池子，还深入到距盐池县城二十公里的牛毛井，聂家梁等地。说骑十九团先到天池子驻扎后移防兴武营不仅时间长，而且又后退了。事实是从骑十九团侵占兴武营到被打垮之日——12月4日，还不到二十天。这期间，我游击队还不断对其骚扰。

其二、骑十九团驻兴武营后，“边区统战部派武装民兵深入兴武营地区开展侦察”，“并设情报网点”，“附近居民纷纷牵羊携酒、担菜、提油来油坊‘慰问’马军”，这都与情不符。马部骑十九团侵占盐池县兴武营等村庄，三边分区和盐池县的地方干部、游击队和

部队都采取各种方法，侦察了解敌情动向。边区统战部派武装民兵去侦察，设情报网点之说是 inaccurate 的。兴武营等村庄为盐池县辖地，行政及民兵组织完整的存在，既谈不上“深入”，也无必要在短暂的时间内设什么“地下工作联络站。”至于说附近居民“慰问”马军，更是奇谈。马军侵占兴武营等地后拷打群众，还抢劫牛羊财物，当地人民无不痛恨，那有心情去“慰问”，即使是为迷惑敌人，如采取的是不合情理的做法，非但不能麻痹敌人，还会因此坏事。

三、《解放军夜袭兴武营》文中讲到袭击兴武营的解放军兵力、出发地、领导指挥等情况也都说的不准确。夜袭兴武营的部队只有警八团，新十一旅的一团、三边军分区骑兵连及地方游击队都是配合行动，并未直接作战。总兵力不到两千人，更不是“两千余人”。这些部队为袭击兴武营和配合作战，在12月3日分别从其驻地出发向目的地开进。警八团到达目的地时，因月亮未落，隐蔽等待到4日拂晓才开始进攻。说“边区部队从定边红柳沟出发”不合事实。红柳沟与兴武营为东南、西北方向，相距近百公里，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此远距离的行军奔袭是不可能的。主力警八团的出发地是在盐池四区雷家沟附近。从这里出发到兴武营也有50公里。袭击兴武营的直接领导、指挥是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而不是边区政府。兴武营战斗，马部骑兵十九团惨败，被我毙伤五十余人，俘虏130余人，缴获战马80余

匹、骆驼130余峰。还缴获枪支弹药军粮等甚多。战斗胜利后，祝捷的首长曹友参、孙殿才为三边地委和军分区的负责人，并非“边区首长”，被俘人员中有的送往延安，是三边分区送去的。说“边区政府派人将我们（即被俘人员），押送到延安”，这就不对了。边区政府本来就驻在延安，边区政府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三边分区政府不能称为边区政府。

四、《马鸿逵进犯三边片断回忆》文中的不符史实之处有：

其一，一九四七年四月初马鸿逵部在定边县城南阊门一带与三边军分区主力部队警备第八团的战斗，是马部要在攻占定边县城前打垮或消灭三边主力部队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他们使知警八团驻扎阊门、彭滩一带，故将全部兵力向阊门、彭滩开进，期望将警八团包围，一举歼灭，并非此文所讲是遭遇战。文中称马部暂九旅“二团三营刚到陈家（实为郑家）大墩正准备支锅作饭，不料，前面发现了共军，战斗打响了。……”。果如此，警八团是不会惨败的，事实是马部并未先包围、进攻定边城，而是向定边城南二、三十里地的警八团驻地进军，步骑兵协同作战，以其优势兵力围攻警八团。警八团在与敌战斗中，虽顽强抵抗，终因被动应战，仅一团兵力，难抵马部步、骑五团之众。马部在打败警八团后，于当日晚上才包围定边城，此时定边守城部队及干部（我是其中之一）民众等已安全撤离

定边城。

其二,定边“城内共军约四千余人仍困守城中,共军为保存实力于当夜12点,以放火为号从南门突围向南山撤走。”我是亲身经历者,这段话不符合事实:一是守城兵力不是四千余人,只有新十一旅二团(不过千人)和民兵(当时叫自卫军)数百人加上所有机关干部充其量不超过二千人。二是撤退时间不是夜12点,而是天刚黑,因已知八团战败,马部必在休息吃饭后围城,故乘其还未围城时即撤出。三是撤退从东门出去,而非南门撤退,撤退临完时,为不给马部留下军草而将积存军草放火烧掉,并非放火为号。马部在此后围城并未发生战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定边城内的民兵、机关干部在撤退时,因未与城外长城守军十一旅二团联系好,致使城内撤出的民兵、机关干部被城外守军开枪阻击,虽未伤人但不少自卫军乘乱逃跑,一场误会虚惊也造成一些损失。

其三,文内讲到马军在定边南郊苏庄一个农民院里包围烧死六、七名共军(其中有一连长)的事,这虽是要反映共军战士英勇不屈,其实无此事。在定边城郊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当时是不会无所传闻的。当时我们虽撤离定边城,但仍在定边山区活动,撤走时也布置有情报工作,我这个从事了解敌情的人就未听到这样的事。再从作者所说此事发生在马部攻占定边大肆清剿时,即在阆门战斗又过一夜后发生的,试想共军战士能

在这一夜内不设法逃走而等死吗？

其四，此文最后一段讲到“七月的一个早晨，旅部接到撤出边区的命令。原因是共产党已胜利地收复了延安，……”。七月，是那年的七月未讲明，与延安收复和彭总率部收复三边相连就有些含混了。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初彭德怀总司令率领西北野战军收复了被马鸿逵侵占了三个月的三边各县，这时延安并未收复。（延安收复是1948年4月间）。但三边收复一个月西北野战军转移后，我们又第二次主动撤出县城到乡村活动，马鸿逵部又二次占领了定边、盐池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次收复。

神仙山下的华北联合大学

陈玉田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华北联合大学迁到我的家乡阜平县神仙山根的平房村，这一带是党中央命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中心区域。

华北联合大学是由设在延安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合并组成，挺进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国防教育。1940年底至1941年是她的全盛时期，设有教育学院、文艺学院、群众工作部和中学部。并把原属边区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抗战建国学院并入，改为法政学院。这所学校先后为边区培养了数万名革命干部，源源输送到边区各条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晋察冀边区还有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同志，就是现在北京人称为“孙胡子”的那位胡子将军。“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抗大校歌。至于华北联合大学的校歌，知道的人还不多。联大的校歌，由校长成仿吾作词，音乐家吕驥谱曲。歌词是：“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刻苦，我们坚定，国土要收复，人

民要自由,新社会的创造要我们担任。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培养我们革命的品质,我们誓死决不妥协投降,战斗啊!胜利就在明日。”

1941年反扫荡后,华北联合大学从平山县迁到唐县、完县一带。以后由于日寇对边区的蚕食,才迁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带——阜平县的平房村。那时环境越来越险恶,客观上不允许很大的后方队伍存在,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学校进行了缩编,撤销了文艺学院、政法学院、群众工作部和中学部,保留华北联合大学的名称,实际上只剩了教育学院,坚持开展国防教育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迁到新的校址张家口以前,联大的同志们在神仙山下,经历了严酷的战斗洗礼,留下了许多英雄事迹,激励着后人前进。

1942年,日寇对我冀中区实行了“五一一大扫荡”,根据地边沿到处是日伪军的岗楼、封锁沟和封锁墙。到1943年,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在敌占区实行强化治安,对根据地和边缘地区实行蚕食政策和残酷的“三光”政策,进行反复“扫荡”。加以当时苏、德战场的决战胜负未定,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反动派乘机掀起反共高潮,根据地逐渐缩小。这是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的艰苦岁月。

那时,从平原向山区运送粮食和物资的路线被敌人截断,根据地的生活极端困难。所有人员一度都没有粮食吃,只能调剂黑豆、大麦之类的马料充饥。黑豆还只

准磨面吃，不准做豆腐。规定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还常常不能保证供应。由于缺乏蔬菜，营养不足，很多同志得了夜盲症。有些人到河里捞“河菜”吃，又发生多起浮肿病，经白求恩卫生学校化验，才知是吃“河菜”中了毒。

为了坚持根据地，渡过严重困难，联合大学同其他机关、部队一样，响应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上山开荒，种粮种菜。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有的地方开荒还一直开到了敌人的炮楼附近。

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时期，许多进步教授、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离开了大城市，冒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源源不断地来到抗日根据地。担任教育学院副院长的于力同志（以后被选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还有林子明老师，就是从北平来到晋察冀边区的大学教授。教育学院政治班的学员，也都是从根据地外各个城市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脱掉西装、旗袍和皮鞋，穿起粗布短衣，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经常累得满头大汗，却谁也不甘落后。学校组织学员到炭灰铺、煤矿背炭，来回八十多里，一人只发给一把红枣供半路充饥，但大家都争先恐后，干得很欢。就这样每人每天还要节省出二两粮，支援受灾区和更加困难的群众。

大学教授也同大家一样，都在一个灶上吃饭。我就见到于力同志双手捧着一个窝窝头啃，吃得很香甜。林子明老师经常对我们说：“喝一碗水等于增加一碗

血。”劝大家要多喝水。这些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那时根本不发工资,每个参加革命的同志,除吃饭穿衣按标准供给外,每月只发两元钱津贴(又叫零用钱),这就是全部的生活待遇。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亲密无间。唯一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取抗日的早日胜利,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求。

华北联合大学的全体同志,还参加了党中央开展的整风运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了搞好学习,联大翻印了廿二个整风文件,用的是白报纸双面油印。这要特别感谢敌占区的地下党和游击区军民,冒着极大危险把白报纸运进了根据地,使我们干部、学员达到了人手一册。

联大既是一所革命学校,又是战斗队、生产队和工作队,开展了对根据地群众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连小孩都组织到儿童团里,负责站岗、送信、查路条,工作严肃认真。“同志你哪里去!路条可带着哩?掏出来看看,掏出来看看,你再过去,现在时局不是马虎的……”。儿童团的歌声,在根据地到处回荡着。

对群众的教育,是通过战斗和生产活动进行的。帮助群众种地、收割,替群众扫院子、挑水,已成为每个同志的日常活动和自觉行动。不管是机关、部队还是学校,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都确已形成了一种鱼水关系。

“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的歌曲，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大敌当前，军民一致。记得1942年边区各地进行军民宣誓的誓词是：一、不做汉奸、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四、不替敌人、汉奸做事；五、不给敌人、汉奸粮食；六、不买敌人货物；七、不用汉奸票子；八、爱护抗日的民主政府，爱护人民自己的八路军。绝不投降，誓不妥协，不怕一切困难，向着胜利永远前进。

华北联合大学同整个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一道，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里，团结一致，克服种种困难，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保存和发展了自己，坚持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银川郊区农业合作化的回顾

沈光英 王文采

银川郊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中共银川市委的领导下,经过贫、下中农特别是贫、雇农的积极参与,经过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光辉的成绩,也有曲折和失误,可以说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它的全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个体农民到生产互助。

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一顺应潮流,反映翻身农民心愿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贫、下中农,特别是贫雇农奔走串连积极参加。到1953年,郊区季节性互助组发展251个,常年互助组89个,6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各种类型的互助组。

互助组是农业合作化三步走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根据当时情况,郊区的生产互助有三种形式:一是季节性互助组(又叫变工组)它的组合形式不固定,且户数不多,一般都是三、五户;二是常年互助组,它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三是联合形

式，它以搞得较好的互助组为主体，吸收附近的组参加，组成比较大的互助联组。后来大多数变成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二、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对郊区各类互助组进行了整顿，将原来的常年互助组合并为66个，季节互助组合并为232个，并重点培养了平伏桥等5个常年组，为即将到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郊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经过试点然后逐步展开。在这方面，三区一乡马王玉、罗占魁领导的互助组起了带头领路的作用。

罗家庄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解放后不久就开始了。1950年秋，田久义、罗占魁按照宁夏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变工互助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在本村率先组织了以工换工的互助组，这种互助组，当年就增加了生产，深受周围群众赞赏。1951年附近的许多农民要求入组，他们吸收了几户，互助组扩大到14户，并把临时互助组扩大成常年互助组。随着互助组的不断扩大，他们又把大组一分为二，由田久义、马王玉分别担任组长，罗占魁出任大组长。1952年春，根据党中央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精神，银川市决定在罗

占魁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郊区第一个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原互助组的14户农民同意办社，并民主选举了五人组成的理事会，罗占魁担任主任。1952年3月6日，也就是土改结束的第六天，银川市郊区第一个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破天荒地出现了。

什么是初级社，初级社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它对劳动力、耕畜和土地，按一定原则折股入社统一管理，按股分红。当时的做法是一个全劳力为一股，耕地以标准田三亩为一股，耕畜以标准畜两头为一股。所有权归个人，使用权归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年终参加分配。当时分配办法是在应分配的收入中，劳畜力股占51%，土地股占46%，公积金占3%。土地股不参加副业收入的分配。以后逐年提高劳力的分配比例，劳力提高到60%，土地股占35%，公积金占5%。初级社当年就显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小麦亩产264斤，水稻亩产692斤，全年平均416斤，比互助组时增长30%，比个体农民韩伏山增长一倍多。由于当年增产，社员收入普遍增加，周围的农民亲眼见到组织起来的好处，纷纷要求入社，第二年扩社时，又增加22户，扩大到36户，罗占魁连任社主任。

在罗家庄农业社的影响下，经过一段准备工作，于1954年春，先后成立了张维邦领导的平伏桥、倪文邦领导的保伏桥（又名幸福社）、张治国领导的新水桥三个